

两汉回首式走兽纹马具试析

陈宗瑞

内容提要 饰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集中出现于两汉时期。该种纹饰原是北方地区特有的纹样，常见于牌饰等金属器物的装饰，具有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格。而其传入中原地区，则与汉代贵族强烈的猎奇心理密切相关。此类马具同时出现于地理跨度极大的南、北方地区，是汉王朝民族政策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关键词 动物纹 马具 汉代 匈奴 句町 文化影响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诸多奇巧的器物，动物纹样或动物造型的马具便是极具特色的一类。饰有回首式动物纹的马具集中出现于两汉时期。根据现有材料来看，此类马具多出于今蒙古、俄罗斯境内的匈奴贵族墓葬中，中国境内也有多地发现。学界关于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于器物名称、性质的考证^①；二是对于动物形象本身及图像象征意义的讨论^②；三是有关器物制造者的推测^③。海昏侯墓中部分马具的公布，为我们提供了将南北方材料串联起来的契机与线索。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发现的回首式走兽纹马具进行梳理，尝试对图像渊源、分布特征及其流动的动因进行探讨。

一 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发现情况

本文所谓“回首式走兽纹”中，“走兽”，即指山羊、鹿、牦牛等栖息于山林、草原的大型四蹄类动物。综合国内外相关材料来看，回首式走兽纹马具出土于下列五处墓葬，现按发现时间列举如下：

1.1924—1925年，科兹洛夫(P.K. Kozlov)率领蒙古—西藏考察团在诺彦乌拉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

① 虽然目前发现的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形制多有相似之处，但命名并不统一，见于报告及研究文章的有牌饰、当卢、马珂三说。该类器物的性质与命名，将在后文中专门探讨。

② 罗坤馨：《广西汉代饰羊青铜器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8期)，2002年；Emma C. Bunker,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pp.54-55；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页102—1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N. V. Polosmak and et al, “Silver Horse Harness Adornments From Suzukteh Burial Mound 20 (Noin Ula, Mongo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1, pp.46-54；林梅村：《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考——兼论匈奴文化对汉代艺术之影响》，《欧亚学刊》(第3辑)，2015年第2期。

③ 马健、邦克、博罗斯马克均认为这批马具产自中原工匠之手。

诺彦乌拉M6出土了回首式走兽纹马具3件，周边均饰有绳索纹，其中2件平面呈葫芦形。1件正面印有一匹牦牛，呈回首状，颈部与背上装饰有细密的鬃毛，腹下毛发呈束状，牦牛足下为成组的波浪式纹样，似为草原，背上有高大树木状纹样，似为山林[图一：1]；1件印有站立回首的长角鹿，无其他装饰[图一：2]；另有圆形银牌饰1件，居中印有回首式牦牛，样式、背景与共出的葫芦形牦牛纹马具一致³[图一：3]。墓葬的年代为新莽或东汉初期²。

2006年，俄蒙联合考古队对诺彦乌拉M20进行了考古发掘，墓中出土饰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银质马具24件，分别为4件葫芦形牌饰和20件圆形牌饰。葫芦形牌饰长14.4—14.5厘米，最宽约7厘米，其中2件印有山羊[图一：4]、2件印有独角兽[图一：5]，均呈回首状，且单蹄扬起。圆形牌饰直径约4.5厘米，其中5件印有山羊[图一：6]、4件印有长角鹿[图一：7]、9件印有独角兽[图一：8]，均呈趴卧回首状³。这批马具均有绳索纹边框，动物的口、眼、肌肉、毛发也都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刻画⁴。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

2.1972年，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了“山羊纹牌饰”5件[图一：9]，平面呈葫芦形，长13.1厘米、宽6.5厘米，鎏金，折边，周边有钻孔，正面压印出一只凸起的山羊(独角兽)，站立举头回望，脚踏山峰，头顶云彩，出土时表面残存羽毛印痕⁵。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⁶。

3.1996年，河南杞县许村岗发现1座大型木椁墓。该墓被盗扰严重，仅残留24件器物，其中有“鹿纹金牌饰”2件，长12厘米，最宽处7厘米，为铅、锡合金模压而成，平面呈葫芦形，器边缘分布一周小孔，中为浮雕神鹿，长角，身有双翼，作回首状[图一：10]。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⁷。

4.1997—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调查了位于查拉姆山谷(Tsaraam Valley)的匈奴贵族墓地，并发掘了部分墓葬⁸。其中7号墓的材料已经发表，该墓被盗扰严重，在墓内东部廊道发现大量马具，包括印有山羊的圆形银牌饰，牌饰直径约12厘米，山羊头部有两长弯角，作回首状，尾巴上扬[图一：11]。

〈1〉 [苏] C.И.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页145，中华书局，2012年。

〈2〉 前揭C.И.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页24。

〈3〉 另有两件圆形牌饰破碎，发掘者并未给出表面图案的描述。

〈4〉 前揭“Silver Horse Harness Adornments From Suzukteh Burial Mound 20 (Noin Ula, Mongolia)”，pp.46-54。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6〉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7〉 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8〉 Sergei S. Miniaev & Lidiia. M. Sakharovskaia, “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Tomb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 *The Silk Road*, Vol. 4, No.1, Summer 2006, pp.41-51; Sergei S. Miniaev & Lidiia M. Sakharovskaia, “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 Part 2: The Inventory of Barrow No. 7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Site”, *The Silk Road*, Vol.5, No. 1, Summer 2007, pp.44-58; Sergei S. Miniaev & Lidiia. M. Sakharovskaia, “An Elite Complex of Xiongnu Burials in the Tsaraam Valley”, *Anthropology &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1.46, No.4, Spring 2008, pp.71-84.

〔图一〕饰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

1. 诺彦乌拉M6出土 (M6:254)
采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页104,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 2-3. 诺彦乌拉M6出土 (M6:255、M6:253) 采自《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 页321-322
- 4-8. 诺彦乌拉M20出土
采自“Silver Horse Harness Adornments From Suzukteh Burial Mound 20 (Noin Ula, Mongolia)”, p.48-49.
9.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 采自《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 页45
10. 河南杞县许村岗墓出土 (M1:18) 采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138,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11. 查拉姆M7出土 采自Sergei S. Miniaev & Lidiia. M. Sakharovskaia, “An Elite Complex of Xiongnu Burials in the Tsaraam Valley”, Anthropology &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1.46, No. 4, Spring 2008, p.75.
12.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K1:710) 采自《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 页62



此外, 与该牌饰共出1件铜牌饰, 平面呈葫芦形, 四周有钻孔, 上有奔跑的山羊图案, 从发表的材料来看, 图案整体为模压而成。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

5.2011—2016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海昏侯墓中清理遗物1万余件(套)^{〔1〕}。车马坑发现有银质叶形当卢, 正面模压有一只独角兽, 举蹄作回首状, 尾部上扬, 头上、足下均有卷曲凸起的装饰纹样, 似为山峰与云彩〔图一: 12〕。墓中该类当卢的出土数量与尺寸不详。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

二 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母题与工艺

饰有回首走兽的器物的定名与功能尚值得探讨。其中,

数件葫芦形器物在原报告中被定名为“动物纹牌饰”, 这种命名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据孙机先生考证, 这类葫芦形器物为马珂, 即系在鞅带上的装饰性马具, 并复原出了这类饰件的佩戴方式^{〔2〕}。国外也有学者对高勒毛都匈奴墓出土的整套马具进行了复原, 同样认为这类器物应是作为装饰系在攀胸和鞅带上〔图二: 1〕。此类器物在盱眙大云山汉墓2号车马坑内出土于左骖马附近〔图二: 2〕, 证明其确为马具,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页103,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图二〕马珂位置示意图

1. 马器具位置示意图

采自周立刚：《探索匈奴文化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纪行》页70，《大众考古》2010年第10期

2. 大云山2号车马坑4号车左驂马局部

采自南京博物院编：《长毋相忘：读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页73，译林出版社，2013年



1



2

孙说可从³¹。关于圆形牌饰功用的争论比较少，马健先生指出这类器物很可能用于装饰马的胸勒和马鞍³²。由此可见，饰有回首走兽的“牌饰”均为装饰性马具，依据形制、佩戴方式的差异可再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叶形当卢，目前仅在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1件；第二类为圆形的胸勒或马鞍饰，共发现22件（2件表面残）；第三类为马珂，平面葫芦形，共发现12件³³。

虽然上述马具在造型上有所差异，且出土地点分布较为零散，但从其母题图案和工艺等方面，能够看出此类器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首先，主体图案多为奔跑迅捷的走兽（以山羊、鹿、牦牛、独角兽为主），细节刻画精细，动态特征鲜明，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³⁴。各器物上的图案虽然细节有所差异，但动物均作回首状，头颈与身体总体呈字母“C”形。图像结构基本一致，动物母题居中，四周或加饰云纹、山林纹样等。从工艺角度看，这类器物也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主体图案都是利用金属的延展性压印而成。有学者对海昏侯墓出土的银质当卢进行了工艺分析，发现该枚当卢采用了镌刻工艺中的细金工艺，

〈1〉 安玮、奚芷芳：《蒙古匈奴贵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他们对高勒毛都M20出土的葫芦形器物进行观察，认为该类器物背后附有两环，从佩戴方式来看应为马当。据笔者观察，这批葫芦形马具存在四周和背后两种穿孔方式，前者为马珂的佩戴方式，后者应为当卢。因此，在对葫芦形马具定性时仍需谨慎，须结合佩戴方式和埋藏环境进行综合考虑。

〈2〉 前掲林梅村《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页103。

〈3〉 本文统计的对象为出土遗物，在乔纳森·塔克的藏品中，另有2件同样母题的铁质镀金葫芦形马具，因缺少明确的出土单位，故未计入统计。详见前掲“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pp.54-55。

〈4〉 杞县许村岗发现的几件马具略有不同，母题图像为背生双翼的麋鹿，这种有翼兽是工匠基于现实动物的联想及再创造，其本体仍可划为走兽进行讨论。

通过台、采、脱髹的技法形成高浮雕纹样¹。其余几件虽然未进行微痕与仪器分析，但从工艺特征、构图风格方面来看，很可能采用了同样的制造工艺。

三 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时空分布与图像渊源

（一）时空特征与墓葬等级

从现有材料看，最早的带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出现于西汉中期，即海昏侯墓中的银质当卢，其余几件集中发现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此类器物发现不多，且出土地点分散，依据地域特征，可分为汉王朝统治核心区与边疆少数民族活动区两大区域，后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区和西南夷活动区。目前来看，主要集中发现于北方地区。

再看出土此类马具墓葬的等级。海昏侯墓与河南杞县的两座墓葬均为典型的汉代木椁墓。海昏侯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和椁室构成，椁室可分为车马库、走道、回廊形藏椁、主椁室²。墓主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葬总体上采用的是列侯的棺椁制度，但同时又具有某些“王制”的影子和王墓的气派³。杞县许村岗汉墓是由墓道和前、后室构成的“甲”字形木椁墓，墓室周边围以石墙。墓葬被盗扰严重，后室置棺椁，三椁两棺，推测墓主生前应属诸侯一级⁴。

查拉姆山谷M7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⁵，位于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诺彦乌拉M6、M20位于蒙古国北部。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可知，三座墓均为匈奴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前者有两重椁，后两者为一棺一椁。

广西西林铜鼓墓属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系统。从骨骼情况推断该墓为“二次葬”，随葬铜、铁器及玛瑙串饰等，以铜鼓做葬具，用“珠襦”裹骨，推测与当时的“句町”有密切关系，墓主应是当地统治阶级一员⁶。

综上，出土回首式走兽纹马具的墓葬虽然分布零散，且墓主族属、身份有所差别，但不难发现，这些墓葬均是中原汉王朝的诸(列)侯级别墓葬或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墓葬，随葬此类马具的墓主生前地位显赫。

〈1〉 杨小林、王浩天：《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外藏椁出土部分当卢制作工艺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2〉 前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

〈3〉 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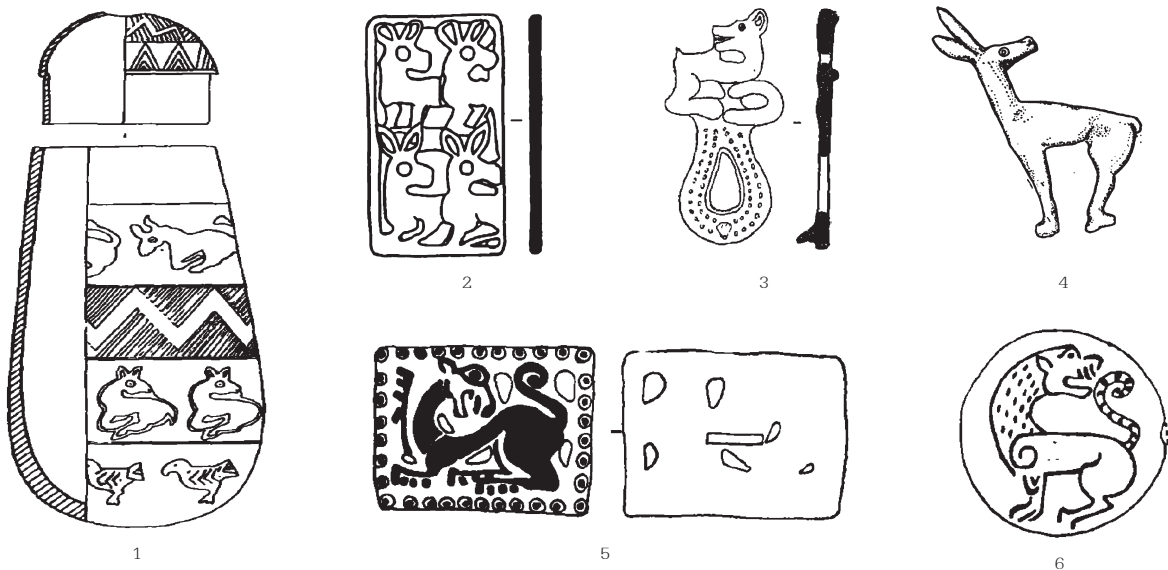
〈4〉 前揭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5〉 前揭“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Tomb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pp.41-51.

〈6〉 前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

〔图三〕北方、西北地区出土的回首式走兽纹器物

1.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铜圆底器 采自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页19
2. 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鹿纹牌饰(M59:1) 采自《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页41
3. 固原杨郎墓地出土铜带扣(IM7:40) 采自《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页32
4. 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出土铜鹿 采自田于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168,文物出版社,1986年
- 5-6. 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出土的铜牌、金箔(85SASM:40、85SASM:41) 采自《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页505,《考古》1988年第6期



(二) 回首式走兽图像母题的渊源

回首动物的形象在考古发现中并不少见,分布也不局限于某一区域。但从整体风格来看,本文讨论的这种回首式走兽纹在中原和西南两地早期遗存中都找不到渊源,而在北方及西北地区却能够找到相关图像存在和演化的证据链。

首先,包括山羊、牦牛、鹿和独角兽等在内的动物纹,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公元前9—7世纪得到了空前繁荣,普遍用以装饰兵器、马具、工具和生活用具¹¹。前文所述马具的纹饰绝大多数刻画细致,身体比例匀称,形态传神,较为写实。这种写实的艺术风格是北方地区动物纹的典型特征。

其次,北方地区汉代以前已经出现了走兽“回首”的形象,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宁城小黑沟石椁墓出土了1件铜圆底器,腹部自上而下饰有四组纹饰,第三组为一圈鹿纹,呈回首奔跑状〔图三:1〕,年代约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周中后期—春秋)”¹²。战国时期,北方地区回首式动物纹的数量和形式增多,单体和群体造型并存。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出土一件鹿纹牌饰,矩形框内为四只透雕回首状鹿¹³〔图三:2〕,同类型的牌饰,在北方长城一带多有发现。单体的回首式动物造型在宁夏固原杨

〈1〉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页94,科学出版社,2008年。

〈2〉 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第5期。

〈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3期。

〔图四〕境外发现的回首式走兽母题器物

1. 铜马牌饰 (Zhurovka G) 采自杨建华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页2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金箔虎 (伊塞克墓) 采自《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页278
3. 金牌饰 (Nymphacum 17) 采自《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页311
5. 毛织鞍垫 (巴泽雷克墓地出土) 采自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页151,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郎墓地^{〔1〕}和内蒙古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墓地^{〔2〕}中均有发现〔图三: 3—4〕。水涧沟门发现的1件铜鹿,四肢伫立,头部为另铸焊接,作惊恐回首状,生动传神。此外,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墓地中发现有2件包金卧虎铜牌和1件模压而成的虎纹金箔,均呈回首长啸状^{〔3〕}〔图三: 5—6〕。除中国外,回首式走兽母题也见于公元前5—3世纪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在图瓦地区、巴泽雷克墓地、伊塞克墓等地点都有发现,母题均为生动的回首走兽形象〔图四〕。由此可见,回首式的走兽形象汉代以前便存在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母题形式多样,并使用透雕、圆雕、模压等多种铸造工艺,具备了自北向南传播的条件,从文化特征和年代序列两方面来看,均可视为回首式走兽纹马具源自北方的证据。

最后,本文罗列的材料中,有一种独角兽纹值得注意。马健、博罗斯马克(N. V. Polosmak)等先生认为这种独角兽可能就是汉代的瑞兽——麒麟。笔者认为“麒麟说”有待商榷,因为独角兽的形象并非中国文化所特有,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一种常见的怪兽形象。有学者罗列了中国境内春秋至汉代考古材料中所见的麒麟图像,发现除独角以外,其他特征并不统一。因此,在目前缺乏“自铭”情况下,独角兽应是更合理的命名。除此之外,林梅村先生指出“麒麟”一词出自吐火罗文,意为“天神”,根据文献记载,麒麟可能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继而推测麒麟的原型为中亚草原的独角羊^{〔4〕}。若此说为真,那么很可能是在汉人接触到北方游牧民族之后,才认识独角羊这种动物,从而创造出“麒麟”这一艺术形象。这可视为母题来自北方的又一例证。

综上,我们认为两汉时期发现的这几件回首式走兽马具,无论是动物母题还是回首造型,都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找到渊源,是斯基泰风格、鄂尔多斯式铜器在汉代的延续。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2〕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出土铜器》,《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页58—5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3〕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考古》1988年第6期。

〔4〕 前揭林梅村《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考——兼论匈奴文化对汉代艺术之影响》。

四 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 分布与传播

前文已论及回首式走兽纹的渊源在北方草原地区。自战国晚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即以较快的速度传入中原，中原文化与斯基泰文化产生融合⁴¹。在战国秦至秦代的文化遗存中，有大量带有“胡风”的动物纹装饰，这些动物纹的母题与风格多常见于欧亚草原文化，很可能是经由“戎狄”影响到秦文化的⁴²。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对“胡风”的喜爱更甚于前代，上述回首式走兽纹马具集中出现于两汉，应与统治者对珍奇异物的喜爱有关。随着中原与周边地区交流增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越发频繁，统治阶级对珍异的猎奇心理愈发强烈。史载：“夫中国一端之纒，得匈奴累金之物。”⁴³皇帝也不吝于将异域奇珍封赏贵族大臣们，如“(光武)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⁴⁴。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社会上层弥漫着浓烈的猎奇之风。汉代的列侯们还会通过使者、商贾、请托，乃至走私、收受贿赂馈赠等方式满足自己对域外珍异的渴求⁴⁵。海昏侯墓与杞县许村岗墓中出土这种带有强烈北方风格的器物应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体现。

而中原以外多地高等级墓葬中出现风格雷同且母题相似的回首式走兽纹马具，应与汉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贵族的封赏与馈赠有关。南、北方几座少数民族贵族墓葬中，共出的大量“汉式”器物亦是佐证。在北方匈奴活动区域，除查拉姆、诺彦乌拉几座墓葬外，高勒毛都墓葬群中，也发现了数件走兽纹器物，虽然器物上的独角兽并未“回首”，但无论动物母题、还是铸造风格，均与已发现的回首式走兽纹马具高度一致，二者之间应存在密切联系。此外，这些墓葬中均发现有典型的“汉式马车”。自汉王朝建立以来，汉匈之间时战时和，史籍中有零星史料涉及车马的流通。《汉书》记载：冒顿单于遣书信羞辱吕后，吕后隐忍回书，并“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⁴⁶。宣帝时，呼韩邪单于向汉廷称臣，获封大量财物，其中便包括“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⁴⁷。这些随葬的马车应该是汉朝政府对匈奴贵族的封赏或馈赠，与其共出的回首式走兽马具也很可能产自汉朝官府作坊。

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发现的几件回首式走兽纹马具，也应与汉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

-
- 〈1〉 崔大庸：《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文物世界》2002年第1期。
 - 〈2〉 史党社：《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页146—15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3〉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力耕》页28，中华书局，1992年。
 - 〈4〉 《后汉书》卷二二《马武列传》，页785，中华书局，1965年。
 - 〈5〉 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页261，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 〈6〉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55，中华书局，1962年。
 - 〈7〉 前揭《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798。

有关。该墓墓主推测为句町首领，《华阳国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①句町与滇一样，同属古代百濮群中的一支，是“南中侯国以十数”中较大的一国^②。汉王朝对西南夷采取“羁縻”策略，这一策略与强制的“同化”不同，主要是通过土著首领“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③。这一政策极大地稳固了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昭帝始元年间，句町族人曾帮助汉王朝平定益州姑缯等部的叛乱，史载“句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例毋波为句町王”^④。当地大族势力是汉政府拉拢、依仗的关键，封赏官爵的同时，贵重物品的赏赐亦不会少。普驮墓中出土的大量汉式器物，很可能就来源于汉王朝的赏赐。考虑到这批马珂的母题、纹样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银质当卢几乎一模一样，有理由推测二者可能出自中原同一作坊，甚至是同一批工匠所为。

（二）仿制与影响

汉代工匠在制作这类马具时，存在“仿制”的现象^⑤。邢义田先生指出，仿制有三层意义：一是制造技术的引入或输出，二是装饰母题或形式的模仿，三是模仿后母题或形式的再创造或在地化^⑥。回首式走兽纹样马具多属于母题或形式的模仿，即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将流行于北方的纹饰，装饰于马具之上，但其中也存在第三种层次，即母题的再创造或在地化。前文已述，回首式走兽纹样马具多为写实风格，细节刻画细腻、真实，但河南杞县许村岗墓的几件马珂则呈现出不同的图像风格。首先，图像结构比例不协调，与身体相比，腿部过于纤细。其次，细节刻画不足，除双角较为细致外，其余如尾巴、胡须、毛发等刻画得极为简单[见图一：10]。笔者推测，许村岗大墓中发现的这几件马珂上的图案，很可能是汉人工匠引入回首式走兽纹样后，在仿制过程中进行的再创造。此外，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发现了不少鎏金铜质的动物纹牌饰，有学者指出这种带绳索纹边框、浮雕动物纹的腰饰牌的最初设计者应为战国时期的秦国人。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牌饰当是汉代工匠继承先前文化的产物^⑦。除北方地区外，出土于汉王朝统治境内的几件马具均无绳索状边框，这种差异很可能也是仿制的结果。中原工匠们在模仿、吸收的同时，对图像进行了选择与重构，舍弃了绳索状边框，形成了一种

①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页59，齐鲁书社，2000年。

② 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

③ 杨雄：《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考古》2018年第4期。

④ 前揭《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页3843。

⑤ 有关中原工匠对北方草原风格器物的制作，可参见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3年第3期。

⑥ 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丝绸之路考古》第2辑，页109—137，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⑦ 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饰牌》，《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南北有别的分布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墓葬中还发现有回首式凤鸟纹马珂，也可视为仿制并再创造的例证。海昏侯墓中，回首式独角兽纹当卢〔见图一：12〕与回首式凤鸟纹马珂共出〔图五：1〕，凤鸟是典型的“汉式纹样”，虽然汉代以前的铜器、玉器上已经发现回首式鸟类的纹样，但这种造型、风格的器物此前并未发现。海昏侯墓中的回首式凤鸟纹很可能受到了回首式走兽纹的影响。饶有趣味的是，晋宁石寨山M7出土了形制完全相同的回首式凤鸟纹马珂〔图五：2〕^①，考虑到石寨山M7的高规格以及大量出土的“汉式”器物，我们有理由推测两地出土的回首式凤鸟纹马珂均产自中原，是通过封赏、馈赠的方式流入滇国贵族的手中的。

五 结语

跨越千里的距离，却能够发现这批特征高度相似、甚至装饰纹样完全相同的马具着实耐人寻味。回首、走兽的图像与写实的风格，表明这批器物与北方草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现有证据可以说明，西汉中期回首式走兽纹传入汉王朝统治区域后，汉人工匠对这种纹样进行了仿制以及再创造，继而将典型的“汉式”凤鸟纹以相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在了同类马具之上。此后，随着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回首式走兽这一特点鲜明的纹样开始自中原向南北辐射。

以回首式动物纹为线索，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各文明间相互碰撞、融汇的图景。猎奇的心理为北方纹样传入中原提供契机，出于政治目的的封赏和馈赠，使得这种具有明显北方草原特色的纹样继续南下，进入西南地区。这既是两汉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质体现，同时也是汉王朝经营区域少数民族关系政策的具体结果。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累增，新的材料会为我们深入理解汉匈关系以及汉代区域少数民族政策提供更多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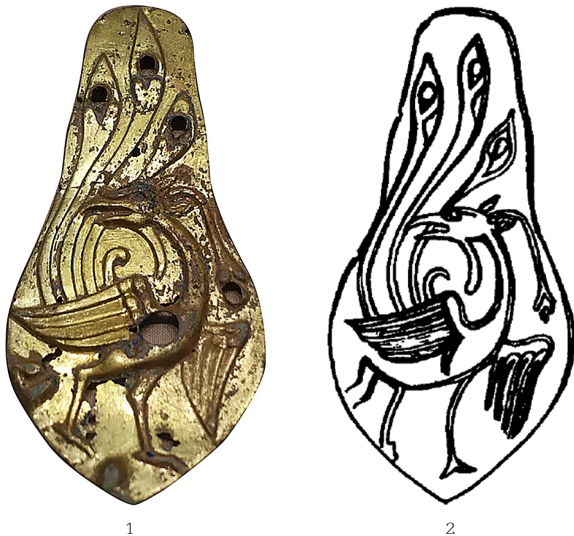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崔大庸、唐仲明、郎剑锋先生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图五〕饰有回首式凤鸟纹的马具

1.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拍摄于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2. 云南晋宁石寨山M7出土
采自孙机：《滇文物小计》，《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页222，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①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98，文物出版社，1959年。